

中國史學史論叢

張孟倫 著

蘭州大學歷史系

一九八〇年九月

前 言

《中国史学史论丛》，内分十个专题，是我试为兰州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学史研究生讲授中国史学史专题写的。内容基本上分为二类：一为有关某一代撰修史书上的一些问题，一为某一代史学名家及其专著，从而也都又涉及了一些史学本身演变、发展的问题。

十个专题，虽然是我个人撰稿的。但撰稿的年岁有先后，因而有的篇章所引用之书，不但注明了篇目，而且注明了卷数；有的却只注明了篇目而未注及卷数，不曾划齐统一，阅者谅之。

十个专题，有些地方所要求于古史学名家的，如果有所偏颇，也都是力求“论从史出”，不是“以论带史”的。

中国史学起源很早，史书之多，汗牛充栋，自是一种范围广泛，而较难研究的学科。加之我个人力量棉薄，学殖荒落，芜秽史部，实不敢以当达者；施之同学，聊省笔录之烦罢了。兹承兰大校党委、历史系总支大力支持，得以铅印成册，敬祈史界先进、读者，批评指教是幸。

张 孟 伦

1980.9.1.

目 录

《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

- 一、撰修最难撰修的《地理志》及其影响…………… (1)
- 二、《汉书地理志》的特点…………… (2)

关于唐代撰修史书上的几个问题

- 一、撰修前代诸史的多种…………… (5)
- 二、官修当代国史…………… (13)
- 三、禁制私修国史…………… (22)

刘知几《史通》评

- 一、关于史籍的编纂…………… (25)
- 二、关于史籍的评论…………… (35)

宋代统治阶级在撰修国史上的斗争

- 一、太祖与太宗的斗争…………… (47)
- 二、新旧两党在撰修《神宗实录》中的斗争…………… (57)
- 三、秦桧摧残国史，迫害史家…………… (61)

从史学价值和政治意义的两方面介绍《资治通鉴》

- 一、《通鉴》是一部中国史学史上的名著…………… (67)
- 二、《通鉴》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保守性，资助统治主子统治天下的史书… (72)
- 三、所作“臣光曰”的评语和所讲读的《通鉴》故事…………… (77)

关于马端临《文献通考》人民性的问题

——与白寿彝先生商榷

- 一、人民性、民族正义感的问题…………… (82)
- 二、尽力散播消极因素…………… (89)
- 三、反对王安石变法…………… (91)
- 四、简短的结论…………… (97)

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四权”史观

- 一、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政权”史观…………… (99)
- 二、加强宗法制度的“族权史观”…………… (100)
- 三、天人相应的“神权”史观…………… (101)
- 四、“夫尊而妇卑”的“夫权”史观…………… (104)
- 五、简短的结论…………… (106)

三夫之的史论

- 一、高度可贵的民族正义感…………… (107)
- 二、反对人民，抑制人民…………… (109)
- 三、轻视妇女。论点是进步的，又是保守的…………… (111)

赵翼《廿二史劄记》中为清政权服务的观点

- 一、为清政权说教以麻痹广大人民…………… (114)
- 二、向清政权献策镇压农民起义…………… (116)

章学诚的史学

- 一、清儒的考据学，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为清政权服务的…………… (119)
- 二、章学诚是怎样对待考据学的…………… (120)
- 三、“六经皆史”的论点…………… (125)
- 四、歌颂清政权…………… (127)
- 五、简短的结论…………… (132)

《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

中国地理之学，虽然发达得很早，但迄未成为一种独立性的学科。班固是东汉时代的人，毋怪作《地理志》，只附在《汉书》里面——从《隋书经籍志》以至《四库全书总目》，都是把地理著作附入史部，而不曾把它看做独立性的专著的。现将《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介绍于下。

一、撰修最难撰修的《地理志》及其影响

《禹贡》，是中国古代地理志的权舆；职方，是中国古代掌天下地图，管四方职责的官名，这因“天下山川险要，皆王室之秘奥，国家之急务”（《宋史·卷四四—吴淑传》）。所以西汉初年，肖何得着秦所藏的图书，因而知道了天下的要塞。以后，汉政府又得到了《山海经》，当更有助于了解各地区的地理情况。武帝时代，有关天下的财政计书，既上之于太史，郡国地志，也就包括在内了。从而也就给汉代史家写作地理志，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然而志，终究是难写作的。这因志所叙述，是乃历代典章制度，经济文化沿革的大端，非是老于典故，博观文物，是很难提要钩玄而着笔墨的。而班固则是个“博观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所不究、所学无常师”（《后汉书·班固传》），而深明会通因仍之义的博学通才。他所著的《汉书》，虽因体裁关系，所有纪传，只以西汉一代为限，却扩大了《史记》八书的范围而撰十志，穷古至今，将所述的典章制度，经济文化，会通其历代因仍损益的关键所在。这就是史学理论名家章学诚也不得不说：“凡司马迁所闢门类，（班）固则补之。非如纪、传所列事迹，但画西京为界也。是以《地理》及于《禹贡》、《周官》，《五行》罗列《春秋》、《战国》。八表之例，可类推矣”（《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后世因之，互有损益，遂为史家一定法矣”（《亳州志·掌故例议上》）。是班固修《汉书》之纪、传限于一代，表、志穷古至今的体裁，实给后世修断代史的史家，奠定了一定的成法。

然而《地理志》，在各志里面，又是较难纂修的。举个例子说：“本（宋）朝《九域志》，自大中祥符六年（1008）修定，至熙宁八年（1065）都员外郎刘师旦言：‘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州县有废置，名号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兼所载古迹有出于俚俗不经者，乞选有地理学者重修之。乃命赵彦若、曾肇就秘书省置局删定，今世所刊者是也。崇宁末（1106），诏置局编修，前后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朱弁《曲洧旧闻》卷五）。这就可见《地理志》因为州县废置等的时有改变，过了几十年，就得重新改修一次。又因改修不易，也又不是每次都能改修成功的。从而到了南宋晚年，王应麟总结出一条经验说：“言地理者，难于言人。何为其然也？日月星辰之变，终古而不易，郡国山川之名，屡变而无穷”（《通鉴地理通释·自序》）。加以户口有变，赋役不一。所以就是史学权威司马迁著《史记》，也只述《河渠》，而未修《地理》。

然而西汉王朝，实是中国封建专制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权。海内混一，郡县增置很多；统治期长，户口增加不少。然而从褚先生、刘向父子以至班彪所写西汉一代的史事，都只能依傍司马迁的《史记》而止于武帝太初年间，做一些续补工作。只有班固才具有雄伟的思想，将昭、宣、哀、平四帝时代的历史继续写了下去，完成了一部整个西汉一代的断代史——《汉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能适应时代的发展，结合现实的需要，而在刘向所言地域，朱赣所条风俗的基础上，加以增补扩充，写成了《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隋书·经籍志》，实为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较为完美的地理专著。

从而一方面使得以后修史书的赞叹敬佩，至有一种仰止高山而趋步难至之感。如范曄著《后汉书》，虽然很自负，认为他这部史书，是“实天下之奇作”（《宋书·范曄传》）。但究不得不称“《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蔑以加矣！因而使得他“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易”（《后汉书·郡国志序》）而修《郡国志》，不敢再作全面性的《地理志》。又如司马彪自命为一代“良史”，而特修《续汉书》（《晋书·司马彪传》），但亦仅志郡国罢了！沈约“博物洽闻，自负高才”（《梁书·沈约传》）。然他受命而撰《宋书》，亦是只能志郡县而已！这就可见从司马迁、范曄、司马彪，以至沈约都是不敢、不曾写《地理志》。反过来，也就足以说明班固写《汉书地理志》的不易，而弥足珍贵了。

一方面使得后代的统治者，越加感到职方图籍之为统治天下所必需的常经大典。于是官修地书：在唐而有《元和郡县志》，在宋而有《元丰九域志》，在元、明、清都有《一统志》；而《晋书》、《隋书》、《唐书》、《辽史》、《金史》、《明史》，都修《地理志》。同时，清人洪颐煊，因为班固所修的《地理志》，“约而能该，详而有法，……精审不苟，取重后世”。乃取班固所说，以推究汉代的水道，而作《汉水道疏证》；清人陈沅因为班固生当东汉统一的强盛时代，得见皇家兰台所藏的图书（请参阅《日知录·秘书国史》），所修《地理志》，也就简明周悉，以故大川所经过的地区，也都记载了精确的里数。便取清代地图，以稽考《汉志》的水道，作出了《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总之，班固的修《地理志》，不但引起了后代统治者，更加知道撰修地理书的重要性；且给后代修地理志的得着了一种最有价值的参考材料（《宋书州郡志》、《北魏书地形志》都说明了这一点），促进了中国地理典籍纂修事业的发展。所以清代治《汉书》极有成绩的王先谦说：“班志地理，存前古之轨迹，立来史之准绳；兼详水道源流，使后人水地相资，以求往蹟，可谓功存千古者也”（《汉书补注序例》）！

二、《汉书地理志》的特点

《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在我们初步看来，有下列几种特点：

1、正因为班固是个博古通今的史家，所以《汉书》虽是一部西汉的断代史，而在《地理志》里，却详尽地讲述了自三代以至秦、汉的星土疆域，建置沿革，封建世系，形势风俗，实是中国史学史上的第一部重要而大有裨益于文献掌故的历史地理。

2、班固撰修《汉书》的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就《地理志》说，对于所收的

资料中的穿凿附会，诡辨不经的说法，都是经过严密的审核。难信的给以剔除，可靠的才加录用，而为后人所赞美、所学习的。包慎言说的好：班固著《地理志》，“刊落诡僻，摭摘详慎，是以后世言地理者，莫不祖述班氏，挨代缀统”（《校刊汉书地理志补注序》）。这就可见班固修《地理志》，对于录用的资料，是经过严密辨别真伪的工夫，力求保存它的真实性，而给后代史家起了一种典范作用。

3、正因为班固对于所录用的史料，是经过严密审订的，所以也就深深地知道说经应以近于古代为得真实的道理。从而他著《地理志》，对于《禹贡》里的山川，都采用了西汉今、古文家的说法。这因地理有沿革，陵谷有变迁。如其用后代人的舆地知识，去解释《禹贡》，那就好象用水平的《官韵》去叶《毛诗》，以王安石的《字说》去训《尔雅》，那有不穿凿附会的呢。清代研究《禹贡》的名家，当推胡渭为第一。但他却昧于经学的限断，只沿史学的地志，而溺于宋以后的臆说，以致所考江、汉、弱、黑诸水，也就错误百出。是知后人之为《禹贡》之学的，尚得一凭班固的《地理志》，而不能恣逞自己的臆见，而说《禹贡》中的地理不同于今天的地理，就不相信呀（本《魏源集·通释禹贡》）。

4、郡县的下面，自加详细注脚（凡在郡县下面的注释，不曾书何人姓名的，都是班固的原注）。因而起了一种保存作者的原意的正确作用。这因作者著书不自作注，而让后人去解释，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个对于古代典籍做过一番考订、注释工夫的朱熹，就曾因为“‘春王正月’四个字之有各家不同的解说说：‘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盛如梓·《庶斋老学笔谈》卷一）。何况更有许多注解家，故意穿凿附会，借古人的说法，企图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种种目的呢。从而只有作者自作自注，既免去了笺注者的许多精神，且又保存了原来的正确意义。洪容斋说的好：“经典义理之说，最为无穷，以故解释传疏，自汉至今，不可概举。至有一字而数说者”（《容斋续笔·义理之说无穷》），又叫读者何去何从呢。然从班固以后，史家著书，往往有手自刊补，列成子注的。诸如：肖大圜著《淮海乱杂志》，杨衡之著《洛阳伽蓝记》，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王邵著《齐志》，莫不都是自撰自注。饮水思源，这当要推美于班固了。但陈寅恪先生的《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却说杨衡之因染习了佛法，乃仿当时僧人合本子注的体裁，故所著于正文之外，复有子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八本二分》）。这就未免有失考据了！

5、班固写《地理志》，以各地风俗为主要题材。一方面郡邑的名字，有的因为土俗的关系，往往有一种方言上的别种称谓。为了整齐划一，都去掉它们原来的俗称，而另用一种新的名字。如改豫章的余干为余汗，梓潼的十方为什方，南海的番禺为番禺，苍梧的肆浦为荔浦，九贞的都龙为都庞等等。从此，全国的郡县称谓，不因他们的习俗方言的差别而有一种不统一的名称。这对促进政治统一，思想交流，情感传播，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记述四方风俗习惯的差异，都能从经济状况，居民成份的变化出发，说明不同的社会意识是不同的经济反映。这种对世界的了解是唯物的。班固又主张因俗施政。诸如：“秦之地险，其俗杂，其政宜绥。巴蜀之地，其俗琐，其政宜拓。魏之地阻，其俗僂，其政宜忠。晋韩之地瘠，其俗嗇，其政宜浹。……”（卢志庵《汉书评抄》）；并赞美了文翁开化偏远落后地区治蜀的成绩。这固然是给统治者从意识形态

上提供统治天下的借鉴，但主张结合具体的地方习俗去办理政治、赞扬发展偏远地区的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还有进步意义的。

6. 黄履翁说：“观班孟坚之志地理，论吴严助、朱买臣之贵显，则继以章山之铜，豫章之金，则吴之人材，其亦三吴之钟欤”（《源流至论》）？总之，《汉书地理志》叙枚乘、邹阳、严助、朱买臣等之群集吴地，致一时“文辞并发”，主要是由于经济的开发，次则是因吴王招集宾客而给以禄位的政治作用。班固在这里是又不曾自觉而天才地意识到文化本身是受着经济发展和政治作用的支配的。从而他虽是个唯心主义史学家，却仍具有朴素自发的唯物主义因素。

7. 班固撰《地理志》，往往“采获旧闻，考迹诗书”；而行文又复结构严密，练词雅洁，而给后人写地理书的，起了一定的典范作用。试看郦道元注《水注》，采集旧著菁英，录用诗歌掌故，而将各地山川，作了一个细腻而生动的叙述，致成为一部历史地理名著。推本穷源，也还是向班固学习来的。

然而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班固谈地理，诚然优点很多，但缺点又何尝没有？西汉古、今文家，多见先秦一些古书，多闻当时师传的说法，其立说则有所的根本，而较后人以意度的臆说自当可靠。所以他认为东汉较西汉去古为远，释《禹贡》而采西汉经师的说法，自然有一定的理由。但信古太过，则也是有泥古不通之弊的。比如司马迁接古代的《禹本纪》而说黄河出于昆仑，班固也就据之而有同样的说法。然后人按“佛书考之。河出昆仑者，此即雪山。而所谓昆仑者，自须弥山也”。班固又复承袭司马迁之说，“且言自张騫使大夏之后，穷河源，乌得所谓昆仑者？此是未知昆仑山所在耳”（《扞虱新话·马迁班固言河出昆仑》）。总之，信古太过，则难免有执文害理的弊病。即以经学大师的郑康成注《毛诗》，因为长于礼学，一一都牵合于《周礼》，也就束缚得厉害，而不免以辞害意。欧阳修博情通群书，而好古信经，以至学术议论，一本于经，废弃三传而不顾。然而三传也并非全以私意而穿凿附会的产物，而是有凭师传之说，有赖简牍之文所写成的，岂可废弃而不一顾吗？那么，信经而废传，据《礼》而谈诗的拘泥不通的害处，穷根追底的说来，又何尝不是从班固而来的呢。

关于唐代撰修史书上的几个问题

李唐一代，撰修史书，在中国史学史上体现出它的特点的：一、撰修前代的史书多种；二、官修当代国史；三、禁制私修国史。兹分别就这三大特点中的几个问题叙述于下。

一、撰修前代诸史的多端

唐代官修前代的诸史，计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六种，在《二十四史》中，占了四分之一。部数之多，超过了中国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王朝。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体现出了它的特点，而又是它有它一定的原因的。

1. 撰修前代诸史的原因及其措置

（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列宁曾指出：历史，“我们是把它当作材料，当作教训，当作往前进行的跳板看待的”。令狐德棻是唐初史家中的先进，他牢牢地记得传说对殷高宗所说：“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信闻”（《尚书·说命下》）的话，言，“尝从容言于高祖曰：‘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请并修之’”。高祖接受了他的意见，因下修撰前代诸史的诏令说：“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穷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善劝恶，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旧唐书 73 令狐德棻传》）。这就是说，撰修前代晋、梁、陈、北齐、北周、隋诸史，是要从她们的兴亡得失的历史事实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为唐代统治的借鉴，而巩固唐的政权。

尤其是自古以来，凡是一个新建立的王朝，没有不把她所覆灭的前朝得失兴亡的历史事实，作为龟鉴的。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大雅·荡》）；所谓“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义民”（《尚书·康诰》）。这种殷以所灭之夏为戒，周以所胜之殷为戒的历史教训，正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思想意识，在人们头脑中永远不可忘记的强烈反映。那末，隋文帝杨坚北灭周，南灭陈，建立了土地广大，国威远震，国势富强的统一大帝国。然而传世只有两代，为时只经短短的三十七年（581—618），便被以李渊父子为首的一群所覆灭。这种活生生的历史现实，也就够使李渊们深刻地认识到必需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以隋王朝这辆覆车，当作他们统治天下的龟鉴了。

（二）、宣扬祖宗功德

一代开国之主，往往是因他的先人，在前代立了一些功业，从而利用当时的情势，取得了他的政权的。沈约自述其在齐奉诏而撰《宋书》就曾说：“臣闻大禹刊木，事炳《虞书》；西伯勘黎，功焕商典。伏维皇基积峻，帝烈弘深；树德在朝，立勋前代。若

不观风唐世，无以见帝妣之美；自非睹乱秦余，何由知汉祖之业。是以掌言未记，爰动天情，曲诏史官，追述大典”（《宋书卷100自序》）。这就把齐武帝肖赜之所以诏令撰修《宋书》，目的在于阐扬他祖父肖承之、父亲肖道成在前代宋的功业，说得很清楚了。那末，唐高祖李渊既继隋而统治天下，又承周的历数，而祖父李虎、父亲李昼的功业，又都建立在周。不修前代史书，则祖父、父亲的事迹，便不能传之于后世（《新唐书》卷102、《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

又，唐初诸史家，大都是前代名门望族的后代，不修前代史书，同样不能宣扬他们祖上的功德，传之后代。这就是以李渊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撰修前代史书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撰修布置

有了以上两个原因，于是武德四年（621），高祖颁下撰修前代史书的诏令：封德彝、颜师古主修《隋书》，崔善为、孔绍安主修《梁书》，裴矩、祖孝孙、魏征主修《北齐书》，窦进、欧阳询、姚思廉主修《陈书》，陈叔达、庾俭、令狐德棻主修《北周书》^①。但决定撰修前代多种史书进程的，最主要的并非人们的意志，而是当时的客观现实的经济条件。因而经过八年之久，诸史并没有修成。

我们知道，武德初年，正值隋末乱离，“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多茂草”（《隋书卷90杨玄感传》）的人口零落、经济残破之后，也就不可能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限度，而使大量撰修前代诸史的工作，底于完成。只有经过恢复农业经济措施，到了贞观三年（629），生产逐步有了发展；而太宗又自称他所做的事有三件，第一件便是“鉴前代成败以为元龟”（《新唐书卷105诸遂良传》）。他经常和弘文馆学士们讨论古今，前代帝王之所以成功失败的缘故（《新唐书卷198儒林传序》）。他吸取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用絀儒者之口；隋炀帝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的历史教训。因之越加深刻地认识到有“睹前代史书，彰善癉恶，足为将来之戒”，“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奖》）的迫切需要。从而对于修撰前代史书这个问题，重新采取了进一步的积极措施：

第一、重新组织一套撰修人员的班子。于贞观三年诏令：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修《北周书》，李百药修《北齐书》，姚思廉修《梁书》、《陈书》，魏征修《隋书》。

第二、为了加强领导，打破了以往惯例，将史馆移入门下省的北面，以便监督；并罢去著作局的职务，由宰相房玄龄担任总监（《文献通考卷51职官》）。

第三、以得力的秘书监魏征负撰修的总责：一面将修成的前代诸史，详加损益。一面指令《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也都由他撰定（《旧唐书卷71魏征传》）。

第四、由当时诸史官中最受宗仰的先进人物令狐德棻担任总裁，制定各史体例（《陔余丛考卷7周书》、《新唐书卷102令狐德棻传》），以期整齐划一。

然而尽管太宗采取了以上这一系列的重要措施，也还不能说，在宰相任监修，秘书监负总责，先进史官当总裁，而史馆且移置宫禁中的门下省的北面，就真正的集中统一，所修成的前代诸史，处处都意见一致，事事都看法一样。因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

下，不但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在一个统治阶级的集团里，各人也还有各人的主义。再加上太宗是很明智而虚心听取意见的人，因而当时官修的前代诸史，是统一领导的，又是允许存异的——以至出现许多严重的分歧。如其说及私修的《南史》、《北史》，则这种分歧，也是同样存在的。

注：(1)、唐初诸史家，多是前代名门望族的子孙：陈述达，陈宣帝的儿子。裴矩，祖父佗，后魏刺史；父纳之，北齐太子舍人。颜师古，先人世仕江左；祖父之推，齐黄门侍郎。孔绍安，陈吏部尚书孔奂的儿子。欧阳询，祖父，陈大司空欧阳颢；父亲，陈广州刺史欧阳纥。令狐德棻，父亲熙，隋鸿胪少卿。岑文本，祖父善方，肖豎吏部尚书；父亲之象，隋末邯鄲令。李百药，父亲隋内史令安平公李德林。姚思廉，父姚察陈吏部尚书。

(2)、《晋书》，同样是所修前代诸史的一种。只以《宣、武纪》、陆机、王羲之二传的结论，是太宗亲撰的，故题御撰，而不包括在内。

2. 撰修前代史书上的分歧

(一)、注重人事与宣扬天命

魏征和当时出身于名门望族后代的史官不同。他父亲只是个北齐的上党屯留令，他小时候也就是个“孤贫”的孩子。他又经受了隋末乱世的磨折，深刻地了解着社会底细。从而使他锻炼成了一个“有大志，贯通学术”的“雅有经国之才”。这表现在撰述史书上，是《隋书王劼传、袁充传》里，不但极为详尽地叙了他们“经营符瑞”，“假托天文”，狐媚取宠于隋文帝，“大为有识者所嗤鄙”的丑恶；且又充分揭发了隋文帝、炀帝“雅信符瑞”的痴愚。结果，弄得“土崩鱼烂，社稷颠隕”（《隋书卷4 炀帝纪》），而要太宗以胜国之隋的一切做面镜子，“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再不要和隋一样，相信唐之统治天下，有什么“天命之可恃”。相反，是要知道“吉凶”、“祸福”，是“唯人所召”的。所以他所作的隋史序论，梁史、陈史、齐史总论^①，主要的都是强调人事，而把天命放在次要的地位。并总结北齐之亡而论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一句话：“天道无亲，唯德是辅”（《北齐书卷9 总论》）。人事不好，天道是不起作用的。这就和撰《北齐书》的李百药，承袭父亲李德林“帝王神器，历数有归，非人力之所能为”的《天命论》（《隋书卷42 李德林传》），而作《封建论》，大肆宣扬“自古帝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旧唐书卷72 李百药传》）；作《北齐书》总论，而谓“乱亡之数盖有兆”；北齐灭亡，是由天命决定的，大有其分歧了。

(二)、书法不隐与记事阿曲

魏征本是唐初“献纳忠说，犯颜正谏”，极负盛名的“诤臣”。他所主编的《隋书》，也就文笔谨严，叙事简练，往往据实直书，不事隐讳。即是虞世南得承太宗优遇，但他却一秉中正，务在审实，毫不掩饰地去直书他哥虞世基的罪恶。这就充分体现他刚直不阿，书法毫不徇情，毫无隐讳的精神。这和“记事阿曲”的许敬宗，“徧忌

阴贼”的李义甫（《旧唐书卷82许敬宗、李义甫传》）修《晋书》，“乌知兰艾、鸾枭之辨”，而以韦忠讨羌为刘聪而死为忠义，以王育、刘敏元“舍顺从逆”而仕于刘渊、刘曜为忠义（《困学纪闻卷13考史》），是绝不相同的。

（三）、记事简严与采掇琐事

魏征既是个操行严正，一丝不苟的一代净臣，因而经他撰定的《隋书》，文字也就格外简练严净，而于琐言碎事，诸如薛道衡死了，炀帝所说“复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李密牛角挂《汉书》等等，都一切删削不载。这和当时撰《晋书》诸家爱好采择《语林》、《搜神记》、《幽明录》等诡谬不经之事，以广异闻，以及给放诞肆情，沉湎嗜酒的刘伶、毕卓作传，以补旧《晋书》之缺的（《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史通卷16杂说上、卷17杂说中》），自是大不相同。

（四）、文势卑弱与雄伟

唐初文笔，沿袭着六朝靡艳的习气，以故不但撰修《晋书》的文咏之士所作的评论，绘藻浮华，不求笃实；就是功业雄卓的太宗，也因骋志文辞，钟爱翰墨，以致所著宣、武帝本纪；陆机、王羲之的传论，亦复绮艳靡丽，气势卑弱。而姚察、姚思廉父子所修《梁书》、《陈书》，却全用散文，条理酣畅，气势雄伟，直欲上追司马迁。至令史笔简洁的李延寿，也不能增损一字。真是蔚然卓绝于诸史家之上，而和他们大所不同。

（五）、浮文收载与删削

姚察修《梁书》，虽在入陈之后，而所据底本，则是梁的国史。因之“各列传，必先叙其历官，而后载其事实，末又载饰终之诏”（《廿二史劄记卷9梁书据国史立传》）^{（2）}的客套照例之文，已是令人厌烦而不愿读。何况姚思廉在唐而修《梁书》，时代既已改易，并非梁的国史，而是前代的“正史”，亦复照旧载入这种加恩饰的诏书，应删削的而不删削，也就越加显得芜冗繁复，令人读之呕吐了。因而李延寿作《南史》列传，将此等连篇无谓的浮文，全部给予删削，而只记载赠谥，那就不但简洁醒目，合乎修史的体例，且与姚思廉大有分歧了。

（六）、肖谥抹去与附录

《梁书》专为肖氏帝王作纪，然而传至敬帝，梁已国亡而统绝，虽然肖谥曾建国称帝于江陵，且达三世之久（时间经历三十三年），却又是周、隋的臣属，也就难在《梁书》里给他作本纪了。同时，肖谥虽曾和元帝（肖绎）结怨，逃死而附于魏，却又非如武陵王纪、河东王誉之称兵以抗元帝的真正叛逆，也又不便给他列入叛逆传内。姚思廉因而左右为难，也就干脆抹去他的事迹不提——既不将他附记在本纪的后面，或者别立一传；也不在他父亲《昭明传》里，载上他的名字。但令狐德棻修《周书》，则以谥北附于北朝，是始于魏而死于周，到他的儿子、孙子，才附于隋，因而就把他附在《周书》后面。是又斟酌得体，而和姚思廉有所分歧了。

（七）南北大事的记与不记

令狐德棻是唐初诸史家中的先进，因而被任为《周书》的撰修，同修者虽然有所更换，主修者却始终是他一人，书法也就显得格外得体。举例来说：当周之时，天下分裂成南北。北有魏、齐，南有梁、陈。而李延寿所修《北史》中的周纪，对于北邻高欢之

死，高澄之篡，南邻侯景之逆，以及梁武、简文、元帝的革易大事，都全不予以记载。但《周书》本纪，则于神武之死，文襄帝之立、之为盗所杀，文宣之废魏帝自立，侯景之奉梁武为主，又立其子纲而废之自立的及纲弟讨擒侯景，是为元帝，都一一记载无遗。也就将南北大事，写得眉清目楚，比《北史》无全中国的观念要得体多了。

（八）、家传法与类叙法

我国“谱系之学，昉于汉，衍于晋，盛于齐，极于梁、唐”（《少室山房笔丛·华阳博议》下）。而李延寿所修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北朝魏、齐、周、隋史事的《南史》、《北史》，并不以朝代为限断，而以家族为限断，也就显得更为突出，不成其为八代的“正史”，而是一种家传了。

原来类叙史法，始于司马迁之写《史记》。如廉颇、蔺相如，窦婴、田蚡，以及《刺客传》、《货殖传》中的人物，都是用类叙法写成的。从而班固的《汉书》，范曄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肖子显的《南齐书》，也都相继沿用了这种方法（参阅《廿二史劄记》卷6《齐书类叙法最善》）。然而李延寿修《南、北史》，却不以事类为叙，而以家事为断。诸如：刘怀珍本是“禁旅辛勤”的将门，他从父的儿子刘峻（孝标），则是文学之士（《南史》卷49《刘怀珍、刘峻传》）。姚思廉的《梁书》，便“取其能文”（《南史》卷49《文学传序》），用类叙法而和到沈、丘迟等人入《文学传》；李延寿则用家传体例，以之入《怀珍传》。又姚思廉《梁书》，以谢朓不但是“文宗儒肆”，且是宋代的忠义（《梁书》卷15《谢朓传》），乃给他独作一传。而《南史》则将他合入其祖父《弘微传》里。须知朓历任宋、齐、梁三代，自当以他所仕最后的一代为定。今以异代之人，写入一家传内，是变《梁书》书法，而与之有分歧了。至于令狐德棻的《周书》，虽曾为长孙俭立传；而《北史》则以俭是长孙嵩的五世孙子，则以之入《嵩传》。是又改国史而为家谱，与令狐德棻有分歧了。诚然，为一人作传，而将他的子孙皆入传内，是从魏、晋以来以门阀取士的习俗演进而来的。以故沈约修《宋书》，已开以子孙附入其祖父传内的先例（如《张茂传》附入其子永，《臧承传》附入其子孚。）；魏收撰《魏书》，则为一人立传，又更进一步地将他的子孙、兄弟、宗族，都一概附入（如崔玄伯、穆崇、封懿等传）。然而沈约、魏收所修的是一代之史，所附也就只一代之人。至于《南史》、《北史》，则一传之中，南朝有历仕于宋、齐、梁、陈的，北朝有历仕于魏、齐、周的，如此尚以一家为限断，不以一国为限断，亦只便于考一家族的世系，而有碍于考一国家的史事。李延寿如此地并合南北各代的一家而作一传，在他自己固然是认为在旧机之中织成了新的花样，实际上是不合史法，弄巧反拙的。

（九）、记事相反

《梁书临川王宏传》，记载了他都督诸军讨魏，前军夺取梁城；《武帝纪》中，又历叙了他所统率的诸将破胶水，克宿预，取合肥，占羊石的胜利。但《南史梁本纪上》，则于诸将的克敌制胜，一字不提；而所记却是“临川王军至洛口大溃，所亡万计，宏单骑而归”。复于传内，详尽地叙述了王“庸怯过甚”不敢进军，以致洛口军溃，大败逃回。又《梁书临川王宏传》，凭借武帝于王死后所下褒扬他的诏书，歌颂了他的嘉猷茂

德。《南史》王传，则把王写成了一个“沉湎声色”，“恣意聚敛”的“钱愚”，阴谋夺权，全无人理的恶逆。同是一个人，而在姚思廉和李延寿的所修的史书里，则大所不同，完全两样了。

(十)、《外戚传》、《文苑传》的有无与所收人物的不同

《隋书》有《外戚传》，《周书》无《外戚传》；《北史》虽和《隋书》一样的有《外戚传》，但又将《隋书外戚传》中的独孤罗，附入其父《独孤信传》里。是魏征修史，不但与令狐德棻有分歧，和李延寿也同样有分歧。

《齐书》有《文苑传》，内列祖鸿勋、李广、樊逊、刘逊、荀士逊、颜之推、袁爽以至古道子等十四人。《周书》无《文苑传》，《北史》虽有《文苑传》，然所取于《齐书》中的文学之士，只是祖鸿勋、李广、樊逊、荀士逊等四人。是又不但李百药与令狐德棻有分歧，和李延寿也同样有分歧。

(十一)、不给沙门立传，与以之入《艺术传》

梁武帝好佛，供养拘那罗于宝元殿，厚待伽婆罗，而姚思廉修《梁书》，并不给他们作传。至于佛图澄，原是后赵石勒所尊重的大和尚，僧涉乃是前秦苻坚所信仰的请雨沙门，鸠摩罗什又是后秦姚兴所礼遇的国师，曇霍本是南凉秃发傉檀时言人死生贵贱的沙门。他们与晋都没什关系，而修《晋书》的诸史家，却把他们一个个载入了《艺术传》，是又与姚思廉修《梁书》有分歧了。

(十二)、对于劳动人民

李百药既是隋内史令安平公李德林的儿子，在隋末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又受到了折磨——“转侧寇乱中，数被伪署，危得不死”（《新唐书卷102李百药传》），也就越加加深了他对广大劳动人民刻骨的阶级仇恨。因而他所修的《北齐书》和李延寿撰的《北史》，存在了严重的分歧。仅就《高昂传》来说，凡是《北史》中所载劳苦人民被官僚地主所虐待、掠夺、惨杀的事件。诸如：自称“地上虎”高昂的母亲堆聚薪火，活活烧死婢女；以及他自己和哥哥多次劫掠乡村，并收养壮士抄掠乡里等等的凶残践踏劳苦农民的滔天罪行；又对御史中丞刘贵听任役夫溺死河中的备极惨酷的恶事，也都一字不提。他和李延寿对待劳苦人民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

注：(1)、本来姚思廉在《陈书后传》后面作了总论；魏征在《张贵妃传》后，又加作了评论。姚思廉在《梁书帝纪》后面，都作了评论；魏征又复《敬帝纪》后将梁各帝综合起来作了一篇总论。这都因为他们的论点，有不尽相同之处。

(2)、如《王章传》诏曰：“旌德纪功，哲王令轨，念终追远，前典明诏”。《吕僧珍传》诏曰：“思旧笃终，前王令典，追荣加等，列代通规”。都是一套例行的无谓诏文。

3. 撰修前代诸史的一致

孔子作《孝经》以教世人，开头一章，即以《开宗明义》命名，以开张其宗本，阐扬其要领，而以孝为“德之本”，以孝为百行之先，而“始于事亲”。又征引《大雅·文王》之诗，阐明“凡为人之子孙者，常念尔之先祖，常述务其功德”（《孝经·开宗明义及疏》），是一种天经地义的天贵责。

及司马迁著《史记》，又复引伸孔子之说，而说什么“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述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不但是这样说了，而且是这样做的。他在《自序》里，追溯他的先祖出于重黎，并历叙他先人司马错以至他父亲司马谈的事业。从而班固作《叙传》，从始祖令尹子文，写到了他父亲班彪的事迹。虽是如此，然究未给他们的先人独立一传。

从魏文帝定九品中正之法，“凡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祖、父官名”（《通考卷28选举》）。于是世族地主阶层，莫不依托高门，矜夸望族，唯恐他们做“子孙不能言其祖先”（《晋书卷51挚虞传》）。肖子显以高帝肖道成的孙子，豫章王肖嶷的儿子，便破天荒的第一次给他肖齐这一朝代修了一部《齐书》，且在他父亲传内，铺张扬厉地写了九千多字。于是“孝之大者”，在于追祖显亲，以论述其功德，自是合乎逻辑的必然归结。所以李唐一经建国，即以撰修前代史书为迫切的一种首要任务而提上了政治工作日程，正是他们君臣之间的一致主张。

（一）、给权贵的父亲伯父立佳传

房玄龄是唐初监修史书的宰相。因而魏征虽然为人忠直，修《隋书》的史笔是很严峻的，也还得给房玄龄无甚功德的父亲房彦谦作了一篇佳传，把他写成了一位“公方宿著，时望所归”，而为叶县人民所爱戴，以至号为“慈父”，天下第一名的好县长。

魏征是太宗所敬畏的名臣，而又总领修史之事，因而他的父亲魏长贤虽然随东魏静帝北迁居邺，以至入齐而都无甚事迹，李延寿还是采取他答复亲故，“屈身以直陈道，甘心于苦节”的信件做材料，在《北史》里给他作了一篇佳传。毋怪王应麟因范祖禹的史官修史，“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唐鉴卷6太宗》）的话言，不禁重新地感慨系之说：“房、魏为相总史事，其父彦谦、长贤皆得佳传，况不如房、魏者乎”（《困学纪闻卷13考史》）？

杜果本来无甚事业，只以他是宰相杜如晦的伯父，令狐德棻也就收入他出使于陈的应对之辞，充当主要内容，给他在《周书》里，作了一篇佳传。

（二）、为父亲立佳传

姚思廉修《陈书》，把他父亲姚察，就写成了一个“非唯学艺越博，亦是操行清修”，而为隋文帝平陈所仅得的一人。但事实上呢？姚察自梁入陈，自陈入隋，朝代改换，官位依然，还能说“操行清修”吗？尤其是在隋历官秘书丞，且多充当炀帝的巡幸侍从，为时几乎要到二十年之久，揆之修史体例，自当以最后所适朝代，规定他为隋人，而姚思廉竟在《陈书》里给他立传。这就很明显地是给他历任三朝，“极出处之致”的父亲作迴护。又姚察在隋修《陈书》，本是以顾野王、傅縡、陈陆琼三家的《陈书》做底本，加以删改而成的（《史通卷12正史》）。但姚思廉作顾野王等传，却只详述他们的其它著作，绝口不谈他们修史的事情。而在父亲传里，则说父亲不但是顾野王等史家“诸人所宗”的泰山、北斗，是文豪徐陵等所尊的“师范”。这又明显地是吹捧他父亲是个“学艺越博”之士，《陈书》是他父亲所独力撰修，而不曾依傍顾野王等所修的《陈书》了。

（三）、为祖父立佳传

令狐德棻修《周书》，给他祖父令狐整立传，而把祖父写成了个“兼资文武，才堪统御”，“处州里则勋著方隅，升朝廷则绩宣中外”的杰出人物。

总之，撰修史书，本应力求真实，取信于人，以完成“彰善瘅恶”的使命。而唐初史家，却以撰述他们祖宗的功德为职志，因而不但为自己的祖父、父亲立佳传，且为权贵们的先人立佳传。毋怪当代的批评史家刘知几要说：“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知。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佳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史通卷7曲笔》），皆非实录了。

何况当时的“秉笔诸臣，多与前朝人物交涉其中，岂无恩怨厚薄？子孙岂无权势挟持，与夫干求请托？亦足以掣史官之肘。则是非之平，前史所遗，端赖后史之补，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章氏遗书·丙辰劄记》）。那末，唐初史官，既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人物，不但与前代冠冕之人，多有关涉，而且同他们的子孙多有交往，天理人情，岂有修前史，而不受这般影响的吗？要在我们后代的读史者，留心研究，为之揭出而已。

4. 撰修前代诸史的成绩

太宗之令撰修前代诸史，是从现实政治生活中，深切认识到确实有从前代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的必要。从而所任监修前代诸史的宰相，便是“贯综墳籍，任人“得尽所能”，“不欲一物失所”，而使“号令典刑，粲然罔不完”（《新唐书卷96房玄龄传》）的房玄龄。房玄龄资望崇高，经验丰富，馆事区处得当，史官任用适宜——根据他们的专长分别配予恰当的任务，那么，修成的史书，还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

比如，编纂《晋书》的诸史官，虽然多是文学之士，爱采诡谬琐碎事故，以广异闻，又所作评论，绮丽不够笃实；而被学者所讥笑，但能用深明星历的李淳风撰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却极足观采（《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不容轻议的。

至于《隋书》中的志，写得比《史记》、《汉书》中的都好，也又是任用人才得当的缘故。所以郑樵说：“《隋志》极有伦类，而本末兼明，唯《晋志》可以无憾。迁、固以来，皆不及也。正为班、马只事虚言，不求典故实迹。所以三代纪纲，至迁八书，固十志，几于绝绪。虽其文彩，灑然可喜，求其实有，则无有也。然观《隋志》，所以该五代、南北朝，纷然淆乱，岂易贯穿？而读其书，则了然如目。良由区处各当其才。颜（师古）、孔（颖达）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修纪、传，而以十志付之（于）志宁、（李）淳风辈，所以粲然具举”（《通志略卷41艺文》）。郑樵既是个极端自负的人，又是个推崇司马迁的人，而《通志略》又是包举历代典章制度极有贡献的名著，亦复对《隋志》给以高度的评价，而为《史记》的八书所不及，则《隋志》自是不刊之作了。从而高似孙亦如鹦哥学舌，而谓唐修《隋书》，区处各当其才（《史略卷2唐修隋书》）；胡应麟撰《史书占毕》，又复同样地说：唐修《隋书》，“用颜师古于纪、传，用李淳风于表、志，唐任人可法者也”。尤其郑樵，不但在《艺文略》中，于唐修《隋书》的任人得当作了极高地赞扬；而且在《校雠略》里，对唐所修的《晋志》和《隋志》，又作了个综合性的任人得当的总评。他说：“唐修晋、隋二

书，皆随其学术所长而授，未尝夺人之所能，而强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风、于志宁之徒，则授之以志；如颜师古、孔颖达之徒，则授之以纪、传。以颜、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图书之学。所以晋、隋二志，高于古今，而《隋志》尤详明也”。就到清朝，史学权威章学诚对唐太宗设史官而命房玄龄监修之任人得当，也作出高度称许的结论说：“唐时修书置馆局。馆局、则各效所长也（《文史通义·说林》）。可见唐初官修史书，以监修区处得当，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是后代史家所公认的。

二、官修当代国史

1. 官修国史的追溯

我国古代，官守其职。史官职责，在彰善惩恶，秉笔直书，国王权臣，也都干涉不了。所以齐太史兄弟三人，虽被崔杼杀了两个，而崔杼弑君的罪恶，还是记载了下来，传之后世，掩盖不了！

我国古代，史书都是一家之作，国家并没设什么史馆，由史官们共撰的。诸如：孔子、左丘、董狐、南史氏，以及汉的司马迁、班固，都是一家修史而成的一家之言，用能劝善戒恶，树立风声，立言不朽。

然而就是这个班固，因为在家修撰《汉书》，竟被人告发入了牢狱。经他弟弟班超替他上书申辨，明帝知道了他的“著述意”思，是如他父亲班彪作《后传》一样，仍是为汉政权服务的，才保全了性命，且被任为兰台令史，而与陈宗等进入国史馆东观，遵照明帝的意旨，撰修《东观汉记》（《后汉书卷70下班固传》）。结果，他在家私修的《汉书》，虽是命世的奇作。但一入史馆与诸史官共同撰修，则不仅显不出他的半点“实录之才”，而只能“虚相褒述”（《华阳国志卷10下汉中士女志》）；就是他所作的《世祖本纪》的文字，也都不值一看了（《史通卷20忤时》）！

从此以后，历代国史，也都限制在国史馆里而由官修。如吴主孙皓以华覈任东观史令。因为孙皓“粗暴骄盈，多忌讳”（《三国志卷48孙皓传》），没法执行史官刚正直书的职责，华覈也就“乞更选贤贤”，不愿就任（《三国志卷65华覈传》）。西晋惠帝既别置修撰国史的专署（《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东晋康帝，又借口“著述重任，理藉贤贤”，而以亲贵元帝“无学术”的儿子武陵王司马晞监修国史（《史通卷10辨职》引《晋起居注》、晋书卷64元四王·武陵王传》）。是为我国史学史上在史局设监领监修国史的开始。

从此，南北朝修史，不但局设监领，而北齐撰修记载国家典章制度的礼书，且以穆彧昭彰，丑声四溢，不学无术的弄臣和士开（《北齐书·卷50和士开传、卷37魏收传》）监修。又用贪污纵淫，罪恶多端的宠臣祖珽监修国史（《北齐书卷39祖珽传》）。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又下令严厉地禁绝民间有撰修国史的（《隋书卷2高祖纪》）。然而禁制私修国史的目的，无非是防制对隋政权的不利。如其有利，私修者也又受到信任，且升官了。这和东汉明帝之对待班固的情形正是相同的。试看王劭在家私修《齐书》，被内史侍郎李元操揭发，文帝初听之下，虽很气愤填膺，命人把《齐